



大夏教育文存

萧承慎卷

主编 杜成宪 本卷主编 王耀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夏教育文存

萧承慎卷

主 编 杜成宪
本卷主编 王耀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夏教育文存, 萧承慎卷/杜成宪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675-6158-8

I. ①大… II. ①杜… III. ①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G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6320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大夏教育文存 萧承慎卷

主 编 杜成宪
本卷主编 王耀祖
策 划 王 熠
项目编辑 金 勇
文字审读 陈长华
责任校对 孙祖安
装帧设计 高 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4.5
字 数 24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6158-8/G·10130
定 价 6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熠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大夏教育文存》编委会、顾问名单

编委会

顾问 孙培青 陈桂生

主任 袁振国

委员 叶 澜 钟启泉 陈玉琨 丁 钢
任友群 汪海萍 范国睿 阎光才



萧承慎教授(1905—1970)

一

1951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建校时,也成立了教育系,这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之源。当时教育系的教师来自大夏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沪江大学等高校教育系科,汇聚了一批享誉全国的著名学者,堪为当时中国教育理论界代表。如:国民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曾实施部聘教授制度,先后评聘两批,各二三十人,集中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各个学科的顶尖学者。两批部聘教授里均只有一位教育学教授,分别是孟宪承、常道直,后来都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孟宪承还为华东师范大学建校校长;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出于“抗战建国”、保证中学师资培养的考虑,建立了六所师范学院,其中五所附设于大学,一所独立设置,独立设置的即为建于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院长为廖世承,后来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上海师范学院(后为上海师范大学)院长;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奠定中国社会事业研究的基础的言心哲,曾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后转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从事翻译工作;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后教育系第一任系主任曹孚,后为支持中央政府成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奉调入京;主持撰写新中国第一本《教育学》、后出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的刘佛年……就是他们,共同奠定了中国现、当代教育理论发展的基础,也奠定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60多年的发展基础。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批著名学者当年藉以成名并影响中国现、当代教育学科发展的代表性成果大多未能流传于世,他们中的很多人及其著作甚至湮没不闻,以至今天的人们对中国教育学科的由来与发展中的诸多重要环节所知不详,尤其是对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对于中国现、当代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性知之甚少,而这些成果中的相当部分实际上又可以看成是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国化探索的代表作。因此,重新研究、整理、出版这些学术成果,对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的学术传承、对于中国的教育学术传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华东师范大学建校之初,在教育系教师名册上的教授共有27位,包括教育

学和心理学两个学科。当时身任复旦大学副教务长的曹孚被任命为教育系系主任,但由于工作原因晚一年到职,实际上教育系就有教授 28 位。除个人信息未详的二位外,建系教授简况见下表。

出生年代	姓名(生卒年)	建校时年岁	学历、学位
1890—1899	赵迺传(1890—1958)	61	大学肄业
	廖世承(1892—1970)	59	博士
	张耀翔(1893—1964)	58	硕士
	高君珊(1893—1964)	58	硕士
	欧元怀(1893—1978)	58	硕士
	孟宪承(1894—1967)	57	硕士
	谢循初(1895—1984)	56	学士
	黄觉民(1897—1956)	54	硕士
	萧孝嵘(1897—1963)	54	博士
	黄敬思(1897—1982)	54	博士
	常道直(1897—1992)	54	硕士
	沈百英(1897—1992)	54	五年制中师
	言心哲(1898—1984)	53	硕士
	陈科美(1898—1998)	53	硕士
	方同源(1899—1999)	52	博士
1900—1909	赵廷为(1900—2001)	51	大学预科
	左任侠(1901—1997)	50	博士
	谭书麟(1903—?)	48	博士
	萧承慎(1905—1970)	46	硕士
	胡寄南(1905—1989)	46	博士
	赵祥麟(1906—2001)	45	硕士
	沈灌群(1908—1989)	43	硕士
	朱有璘(1909—1994)	42	学士
1910—1919	曹孚(1911—1968)	40	博士
	刘佛年(1914—2001)	37	学士
	张文郁(1915—1990)	36	学士

(本表参考了陈桂生《华东师范大学初期教育学习纪事(1951—1965)》一文)

可见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初建、教育学科初创时的教授们,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15人,20世纪00年代的8人,10年代的3人;60岁以上1人,50—59岁16人,40—49岁7人,40岁以下2人,平均年龄50.73岁,应属春秋旺盛之年。他们绝大部分都有留学国外的经历,有不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其中博士8人,硕士11人,学士4人,大学肄业1人,高中2人。他们大体上属于两代学者,即出生在19世纪90年代、成名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代(五六十岁),出生在20世纪、于二三十年代完成学业的一代(三四十岁)。对于前一代学者而言,他们大多早已享有声誉且尚未老去;对于后一代学者而言,他们也已崭露头角且年富力强。相比较而言,前一代学者的力量又更为强大。任何一个高等院校教育系,如能拥有这样一支学术队伍都会令人感到自豪!

三

令后人感到敬佩的还在于这些前辈教授们所取得的业绩。试举其代表论之,以观全豹。

1923年,将及而立之年的孟宪承撰文与人讨论教育哲学的取向与方法问题,提出:教育哲学研究是拿现成的哲学体系加于教育,而将教育的事实纳入哲学范畴?还是依据哲学的观点去分析教育过程,批评现实教育进而指出其应有价值?他认为后者才是可取的。理由是:教育哲学是一种应用哲学,应用对象是教育;教育哲学研究导源于实际教育需要,是对现实教育的反思与批评,而其结论也需要经过社会生活的检验。这样就倡导了以实际教育问题为出发点的教育哲学,为中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理论的转型,即从以学科为出发点转向以问题为出发点,转向更为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注儿童,从哲学层面作出了说明。之后,不刻意追求体系化知识,而以问题研究为主、从儿童发展出发思考教育问题成为一时潮流。1933年,孟宪承出版《教育概论》,就破除了从解释教育和教育概念出发的教育学理论体系,而代之以从“儿童的发展”和“社会的适应”为起点的教育学叙述体系。在中国,以儿童发展为教育学理论的起点,其首倡者很可能就是孟宪承。1934年,教育部颁布《师范学校课程标准》,其中的《教育概论》纲目与孟宪承著《教育概论》目录几乎相同。而孟著自1933年出版至1946年的13年里共印行50版,是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教育学教科书之一。可以看出孟宪承教育学思想对中国教育学理论转型、教育学学科建设、课程建设、专业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的深刻影响。

1921年,创始于美国、流行于欧美国家的一种新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道尔顿制传入中国,因其注重个别需要、自主学习、调和教学矛盾、协调个体与群体等特点,而受到中国教育理论界和中小学校的欢迎,一时间,诸多中小学校纷纷试行道尔顿制,声势浩大。东南大学附中的道尔顿制实验是其中的典范。当时主持东南大学附中实验的正是廖世承。东南大学附中的道尔顿制实验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严格按照教育科学实验研究方法与程序要求进行,从实验的提出、实验的设计、实验的实施、实验结果分析各个环节都做得十分规范,保证了实验的信度和效度,在当时独树一帜。尤其是实验设计者是将实验设计为一个与传统的班级授课制进行比较的对比实验,以期验证两种教学组织形式的长短优劣。在实验基础上,廖世承撰写了《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报告依据实验年级各科实验统计数据、实验班与比较班及学生、教师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了实施道尔顿制的优点与缺点,得出了十分明确的结论:道尔顿制的特色“在自由与合作”,但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很难实行;“班级教学虽然有缺点,但也有它的特色”。廖世承和东南大学附中的实验及报告,不仅澄清了人们对道尔顿制传统教学制度的认识,还倡导了以科学研究解决教育问题的风气,树立了科学运用教育研究方法的楷模,尤其是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了如何对待和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经验,深刻影响了中国教育的发展。此外,廖世承参与创办南京高师心理实验室首开心理测验,所著《教育心理学》和《中学教育》,在中国都具有开创性。

1952年曹孚离开复旦大学到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是教育系第一任系主任。1951年,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撰成的《杜威批判引论》出版。书中,曹孚将杜威教育思想归纳为“生长论”、“进步论”、“无定论”、“智慧论”、“知识论”和“经验论”,逐一进行分析批判。这一分析框架并非人云亦云之说,而是显示出他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深刻理解和独到把握,超越了众多杜威教育思想研究者。他当时就指出杜威教育思想的主要缺陷,即片面强调活动中心与学生中心,忽视系统知识的传授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对杜威教育思想有深入研究的孟宪承曾称道:“曹孚是真正懂得杜威的!”后来,刘佛年在为《曹孚教育论稿》一书所做的序中也评价说:“这是我国学者对杜威思想的第一次最系统、最详尽的批判。”曹孚长于理论,每每有独到之论。50年代的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界,先是亦步亦趋地照搬苏联教育学,又对包括教育学在内的社会学科大加挞伐,少有人真正思考教育学的中国化和构建中国的教育学问题。曹孚在其一系列论文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教育学的学科基础包括哲学、国家的教育方针

政策、教育工作经验、中国教育遗产和心理学五方面；针对当时否定教育继承性的观点，他提出继承性适用于教育，因为教育既是上层建筑，也是永恒范畴；对教育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他批评以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为标准，从哲学、政治立场出发的评价原则，主张将哲学思想、政治立场和教育主张区别而论，主要依据教育思想来评价教育人物；他认为，即使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也不是一无是处，不能“一棍子打死”，也有可以吸取和改造的。在当时环境下，曹孚之言可谓震聋发聩。

1979年，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新时期”全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教育学教材。之前，从1962年至1964年曾四度内部印刷使用，四度修改。“文革”中还被作为“大毒草”受到严厉批判。1961年初，刘佛年正式接受中宣部编写文科教材教育学的任务。当年即撰写出讲授提纲，翌年完成讨论稿。虽然这本教育学教材在结构上留下明显的凯洛夫《教育学》痕迹，但也处处体现出作者对建设中国教育学的思考。教材编写体现了对六方面关系的思考和兼顾，即政策与理论、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阶级观点与历史观点、历史与理论、正面论述与批判、共性与特性。事实上这也可以作为教育研究的一般方法论原则。在教材编写之初，第二部分原拟按德育、智育、体育分章，但牵涉到与学校教学工作的关系，出现重复。经斟酌，决定按学校工作逻辑列章，即分为教学、思想教育、生产劳动、体育卫生等章，由此形成了从探索教育的一般规律到研究学校具体工作的理论逻辑，不失为独特的理论建构。1979年教材出版至1981年的两年间，印数近50万册，就在教材使用势头正好之时，是编者主动商请出版社停止继续印行。但这本教育学教材的历史地位却并未因其辍印而受到影响，因为它起到了重建“新时期”中国的教育学理论和教材体系的启蒙教材作用。

不只是以上几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创系教授在各自所从事的研究领域都有开风气之先的贡献。如，常道直对比较教育学科的探索与开拓，萧承慎对教学法和教师历史及理论的独到研究，赵廷为、沈百英对小学各科教学法的深入探讨，沈灌群对中国教育史叙述体系的重新建构，赵祥麟对当代西方教育思想的开创性研究，等等，对各自所在的学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被载入学科发展的史册。还有像欧元怀，苦心经营大夏大学二十多年，造就出一所颇有社会影响的著名私立高等学府，为后来华东师范大学办学创造了重要的空间条件。所有前辈学者们的学术与事业，都值得我们铭记不忘。

四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将此次编纂《大夏教育文存》视为一次重新整理和承继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优良学术传统的重要契机。

我们的宗旨是:保存学粹,延续学脉,光大学术。即,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术精华加以保存,使这些学术成果中所体现的学术传统得以延续,并为更多年轻一代的学生和学者能有机会观览、了解和研究前辈学者的学术、思想和人生,激发起继承和发扬传统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实现我们的宗旨。

就我们的愿望而言,我们很希望能够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一代代前辈学者的代表作逐步予以整理、刊布,然而工程浩大,可行的方案是分批进行。分批的原则是:依据前辈学者学术成果的代表性、当时代的影响和对后世影响的实际情况。据此,先确定了第一辑入选的11位学者,他们是:孟宪承、廖世承、刘佛年、曹孚、萧承慎、欧元怀、常道直、沈灌群、赵祥麟、赵廷为、沈百英。

《大夏教育文存》实际上是一部华东师范大学建校后曾经在教育学科任教过和任职过的著名学者的代表作选集。所选入的著作以能够代表作者的学术造诣、能够代表著作撰写和出版(发表)时代的学术水平、能够为当下的教育理论建设和教育实践发展提供借鉴为原则。也有一些作品,我们希望能中国的教育学术事业的历程留下前进的脚步。

《大夏教育文存》入选者一人一卷。所收录的,可以是作者的一部书,也可以是若干部书合为一卷,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代表性论文的选集,还包括由作者担任主编的著述,但必须是学术论著。一般不选译著。每一卷的选文,先由此卷整理者提出方案,再经与文存总主编共同研究商定选文篇目。

每一卷所选入著述,在不改变原著面貌前提下,按照现代出版要求进行整理。整理的内容包括:字词和标点符号的校订,讹误的订正,专用名称(人名、地名、专门术语等)的校订,所引用文献资料的核实及注明出处,等等。

每一卷由整理者撰写出编校前言,内容包括:作者生平、学术贡献、对所选代表作的说明、对所作整理的说明。每一卷后附录作者主要著作目录。

五

编纂《大夏教育文存》的设想是由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的范国睿教授提出的。他认为,作为中国教育学科的一家代表性学府,理应将自

己的历史和传统整理清楚,告诉后来者,并使之世代传递下去。实现这一愿望的重要载体就是我们的前辈们的代表性著述,我们有责任将前辈的著述整理和保护下来。他报请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办公会议批准,将此项目立项为“华东师范大学优势学科建设项目”,获得资助。还商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支持和资助,立项为出版社重点出版项目。可以说,范国睿教授是《大夏教育文存》的催生人。

承蒙范国睿教授和时任教育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汪海萍教授的信任,将《大夏教育文存》(第一辑)的编纂交由本人来承担,能与中国现、当代教育史上的这些响亮名字相伴随,自是莫大荣耀之事。要感谢这份信任!

为使整理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我们恳请孙培青、陈桂生两位先生能够担任文存的顾问,得到他们的支持。两位先生与入选文存的多位前辈学者曾是师生,对他们的为人、为学、为师多有了解,确实给了我们很多十分有价值的指点,如第一辑入选名单的确定就是得到了他们的首肯。对两位先生我们要表示诚挚的感谢!

文存选编的团队是由教育学系的部分教师和博士、硕士生所组成。各卷选编、整理工作的承担者分别是:孟宪承卷,屈博;廖世承卷,张晓阳;刘佛年卷,孙丽丽;曹孚卷,穆树航;萧承慎卷,王耀祖;欧元怀卷,蒋纯焦、常国玲;常道直卷,杨来恩;沈灌群卷,宋爽、刘秀春;赵祥麟卷,李娟;赵廷为卷,王伦信、汪海清、龚文浩;沈百英卷,郭红。感谢他们在选编和整理工作中所付出的辛劳和努力!研究生董洪担任项目秘书工作数年,一应大小事务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十分感谢!

尤其是要感谢入选文存的前辈学者的家属们!当我们需要了解前辈们的生平经历和事业成就,希望往访家属后人,我们从未受到推阻,得到的往往是意料之外的热心帮助。家属们不仅热情接待我们的访谈,还提供珍贵的手稿、书籍、照片,对我们完成整理工作至关重要。谢谢各位令人尊敬的家属!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文存出版的大力支持!也感谢资深责任编辑金勇老师的耐心而富有智慧的工作,保证了文存的质量。

感谢所有为我们的工作提供过帮助的人们!

杜成宪

2017年初夏

一、

萧承慎(1905—1970),湖北江陵人。1926年考取大夏大学^①,193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教育学系,同年10月留学美国^②,193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硕士学位。1933—1944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学院研究教育理论。曾任中央大学、河南大学教授,国立编译馆编纂,复旦大学教授、教育系主任。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教育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兼秘书长。1956年被评为二级教授,1970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萧承慎先生公开出版、发表的论著主要有《现代中国青年学生烦闷之原因及其救济之方法》(1923—1924)、《分数及记分制度》(1932)、《我国中学校长制度之探讨》(1934)、《莫礼生教学法》(1936)、《师道及师释名》(1943)、《教学之态度》(1944)、《师道征故》(1944)、《中外尊师观念之演变》(1945)、《教学原则简释》(1946)、《教学法基本概念的检讨——新民主主义下的教学法的新基本概念》(1949)、《教学原则的检讨》(1950)、《苏联专家给我的教育》(1954)、《苏联专家娥·芙·杰普莉茨卡娅同志对办理教育学研究班的指导》(1956),参编《教育学讲义(初稿)》(1959)。1940年,先生应湖北教育厅之邀,充任该省国民教育干部讲习班讲师,从素日在大学所授之《普通教学法原理》中撷取三讲,命名为《教师之基本素养三讲》。该讲稿虽未正式出版,但因付诸刳劂,故得以流存,成为其仅有的两种代表著作之一。

限于篇幅,本卷所整理的萧承慎先生成果为其所仅存的两部著作——《教师之基本素养三讲》与《师道征故》。这两部著作代表了其学术研究的两个基本方向——教学法与教师教育。

① 《申报》1926年8月19日,第3版。

② 《最近一年赴美学生调查录》,《湖北教育厅公报》第2卷第16期(1931年8月)。按:该表依据卡德路寰球中国学生会的调查,记录最近一年留美学生216人。表中谓萧氏籍贯为浙江恐有误。另刘真主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台湾编译馆1980年版,第1875页)亦引有此表。

二、

《教师之基本素养三讲》分三个部分：一、我国教学法之演进；二、教学之基本概念；三、教职之特性及教师之人格。第一部分，作者从教学法一辞的来源谈起，系统阐述了我国教学法的发展史，认为我国古代缺少教育原理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具体而言有：1. 我国自古缺乏专史，而关于教学之史料又甚少；2. 古代典籍所载教育史料多系官学、选举、考试之叙述，而于教材与教法则湮没不彰；3. 古代教育家多从大处着眼，不甚注重教学技术的探讨；4. 师承的教育模式和书籍的匮乏，使得教师教授重口授演讲，学生学习重诵读记忆，不甚重视教学技术的理论；5. 古代教育内容囿于儒家经典，重视熟读熟记、勤作勤写；6. 中国古代教育为教训合一，重视变化气质，故“教学原理多只谈到最后的目标及重要的原则，而缺少复杂的、形式的实施之步骤”；而采用西方教育制度以来，因崇尚其教育原理与方法，一味模仿，故对于传统教学原理缺乏探求；7. 中国古代教育着重于情意培养，与以知识为本质而重视教学技术的西方教育完全不同；8. 受儒家经典重视师资修养、学生自动、个性适应等教学原则的影响，后世学者多在此方面作发挥。综上，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最缺乏“形式的、复杂的教学实施步骤之理论及各科教学之原理与实施”，但于一般教学基本原则则多有探讨，且较为精透，只是散于各家各种著述中。为此，作者分专篇论述了《学记》重视师资、提倡学生自动、适应个性、问答得体、藏息相辅、豫时孙摩等教学原则以及与孔孟之教学原理的互为发明，扼要了历代各家诸如荀子、徐干、胡媛、程颐、朱熹、王守仁、王筠等人的教学原理思想，概述了私塾的教学过程。此部分，作者引经据典，史论结合，以新式教育的视角，深度挖掘了古代中国较为著名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原理，对传统教育作了较为中肯的评介，于旧式教育多有发明。

采用西方教育制度以后，教学法变革较为迅速，对此萧氏作了较为详实的论述与介绍，认为新式教学法之演进可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采用新式教育制度至《钦定学堂章程》颁布），中西杂糅；第二阶段（至民国肇兴），师范、小学教学法主要为赫尔巴特五段教学法，中学为注入式教学；第三阶段（至1914、1915年），小学教学法由注入式进为启发式，但仍注重“教”而未顾及“学”，中学依旧通用注入式之演讲主义；第四阶段（至1918、1919年），自学辅导与分团教学法输入，始注重“学”，“但教学原则仍以五段为依归”，幼儿教育引进蒙台梭利教学法，中学则渐倾向于启发式之自动主义；第五阶段（至1927年），在教育革新运动的影响下，各种教育法普遍输入，其中设计法与道尔顿制影响最大，心理

及教育测验与教学实验亦对教学产生较大的影响;第六阶段(至40年代),本土自创教学法迭兴,影响巨大者有陶行知“教学做合一”、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组织教育”与康方教学法,而国外教学法如社会化、德可乐利、莫里森、文纳特卡等教学法亦纷纷介绍或实验开来。纵观各阶段教学法之演进,萧氏指出:“确有不少的进步,但是这种情形都是几个优良的学校成绩与宣传,并非一般现象。”一般现象为何?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报告——《中国教育之改进》说得非常清楚:小学教学法“概以演讲出之,教师用此法以灌输知识于全级儿童,学生不过为接受知识之人而已。盖中国学校之学生罕有由教师加以问答者,更鲜有令其从事独立之工作者”,“许多中学之教学方法,应加以彻底的改革。以讲演为唯一的或最好的教学方法……此种观念在中学流毒尤甚”。

第二部分探讨教学之基本概念,萧氏并未阐明教法与教材的关系,或教法概念的历史变迁,而是分析了时人对于教学的三种基本观念:教学是一种经验的或实地的艺业,教学是一种应用科学,教学是一种美术(或作艺术)。对于第一种观点,作者引用米勒《人生教育》之观点,通过分析专业与艺业的区别,指出教职是专业而非艺业,从而确定教学的专业性。1944年,在《教学之态度》一文中,萧氏再次明确指出:“教学是一种专业,而非行业。……行业与专业的区别在前者是遵循已成的例规,由熟练而成技巧,后者则利用原则因事制宜而随机应变。教职(教学职业或教学职务)之应属于专业,是因为教学之事,其所遇的情况甚繁,其动作的范围甚广……必须有多量之自动的能力与独创的思考,审度情势,洞明底蕴,因事制宜,始能完成其任务。”^①教学是应用科学抑或美术,作者分别以弗里曼与巴格莱的观点为代表、以我国教育研究为事例,从正反两面作了分析批判,认为“从事实上观察,教学之初步,乃是科学,而教学之极境,确为美术……优良的教学绝非只是循规蹈矩,遵守教育科学的法则,而是在循规蹈矩中又能纵横如意,无心于法则而自合于法则”。从利弊上看,他本人宁倾向于教学是一种美术,并求证于美国学者杜威、帕尔默、麦克默里、鲁格、芬尼以及中国学者艾伟等人的观点。以教育的使命而言,萧氏也主张教学是一种美术,认为提倡教学是一种美术在当时有着迫切的需要,呼吁“富有宗教般的热情之教师,而非仅有教学技术之教师。教学是一种美术,教师应充满着爱文化、爱学生之热情及学术可以救国救世之信念!”

第三部分,关于教职之特性,萧氏认为教职是一种魔力极大的职业,能吸引

^① 《教学之态度》,《文化先锋》第4卷第8期。

许多优秀分子从事此项活动；以史乘证之，教学职业之得失实为民族兴亡之枢纽。然而，教学成为一种专业而非艺业，只是现代社会的趋势，历史并不长。教职不仅是专业，也是最富有趣味的专业，同时更是少有的利人自利的专业。教师应以效忠民族、造福儿童为职志，个人不允许有营利之目的，这成为师尊的重要理由之一。然而，时至今日，不少教师唯权利是图，试问又如何能赢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所以，成功的教师必须能不求名利、安贫乐道，以韩愈所云“业患不能精”、“行患不能成”为信条。如何成为一名成功的教师呢？早在1934年于江苏女师附小讲演时，萧氏即指出要做一名成功的教师应注意九点：1. 养成专业的精神和态度；2. 教学时应有的品格，如公正的态度；3. 人生的见解应求广博；4. 应具有继续生长的理想；5. 要严格批评自己；6. 应注意教育是教“人”，不是教“书”；7. 教育方法应多变化；8. 应注意对儿童的了解；9. 应具有研究的精神。^①在本部分，他承继并发挥了此前的观点，认为其首要条件是顺利地完成每日的教学工作，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内在因素如教师之人格、专业之把握、对学生的了解、教学之技能等，外在因子如教师之声望、与同事的关系、对人生的态度等均足以影响教学的成败。综合起来，萧氏认为若要成为成功的教师，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有专业的态度和理想，有广博的学问，有继续生长的理想，抱科学的态度，善于变换教学方法，教学程序富有弹性，在知识方面诚实，教学目的上要注重质的精熟，谨慎地选择和运用教本，教学技术能运用自如，服从专业的伦理信条，严格批评自己之人格。关于教师之人格，萧氏突破传统单纯的道德说法，汲取当时西方人格研究的最新成果，尤其是德国文化教育学派的观点，指出教师应具有的典型人格粹质包括：教育的爱、公正、同情、幽默感、自制力、热心、忍耐性、自信力、康健、可爱的仪表、良好的声调。若不完全具备这些教学人格粹质，教师亦不要灰心，因为许多人格粹质是可以培养的；但是教师也要注意自己强健的人格不要被误用，以免造成虚假的成功。

三、

《师道征故》是作者“明师之究竟”，专论教师之道的专著。该书“哀辑自古尊师之史实”，继承中国古代尊师重道的传统；“据摭大儒之名言，掇拾大师之景行”，绍述并发扬了先圣贤哲有关师道之遗绪，拟为三目，曰：为师之道、尊师之

^① 《成功之教师——在苏女师附小讲》，《江苏省小学教师半月刊》1934年第13期。

道、求师之道，以“期发覆师道之全貌”。

为师之道篇，萧氏探赜了古代字书、经籍有关“师”字之字源及其字形、字义的变迁，指出古代所谓师者，“乃聚善积德，而出于其类，拔乎其萃，以德行善道为众之长，而教谕诸德者也”，其意义先后经历了出类拔萃之官长、教化万民者、以传道授业为其专职者三个阶段。通过摘绎《学记》、《儒行》、孔子、孟子、荀子、扬雄、韩愈、周敦颐、章学诚等先哲遗教，以及孔子、墨子、郭泰、书院师儒、大师风骨、师儒神态、化民成俗等师儒遗风，萧氏指出，“为师之道，端在德行道艺有于身，而超乎其类，拔乎其萃，聪明睿智，皆如泉涌，砥节砺志，行可仪表，以身率教，而为人之模范”，简言之，为师之道在于德行道艺兼修，为人、为学、育人并举，而以德行为重。因此古昔师儒，砥节砺行，守道崇礼，器量弘深，光风霁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浩然之气，充塞宇宙；学而不厌，博闻强识，雅通坟典，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传道授业，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博喻诵说，循循善诱，教学相长——“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是以师道立焉。师之所存在于道，经明行修，理胜义立；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可见为师之道乃师道之重心。

尊师之道篇，通过梳理相关史实，萧氏分析了古代尊师之礼的主要表现：释典与祭祀先师，“天地君亲师”之神主供奉，束脩之礼，帝王尊师之“西席”礼，“心丧”之哀与弟子之礼，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萧氏指出自古尊师除了师儒安贫乐道、胜理行义、疾学厉行、以身示教、利人之德、成身之功外，还在于：一，重道敬学，乃能化民成俗，建国兴邦；二，崇德报功，始可敦风厉俗，振奋群伦。师长之尊，因天经地义；而师弟子之道，则兼有父子兄弟朋友之道。萧氏认为师道尊严之树立，固在尊严师道，而非专以尊严为教；在于教师人格之感化，而非恃科条与威仪。

求师之道篇，萧氏谓“能自得师者王”，指出古之圣贤，莫不学而不厌，无常师，师万物，闻善而从，见贤思齐。其求师皆不问年龄之长幼、地位之尊卑、贤与不肖，苟有善言善行、或一技之长，则欣然从之，“三人行必有我师”、“圣人无常师”与“一字师”即是体现，足见古人善求师、求学之态度。然就师道而言，为人师者，须有道于身，经明行修，殆不可有学诣而无德行。能自求师，则能自得之，如此学可至大成，教可臻于无教之教育极境。

《师道征故》是萧氏对中国传统师道问题的一个系统阐释，而后在《中外尊师观念之演变》^①一文中，他又考察了西方古往今来尊师之演变，并落脚于今日

^① 《中外尊师观念之演变》，《教育心理研究》1945年第3卷第1—2期。